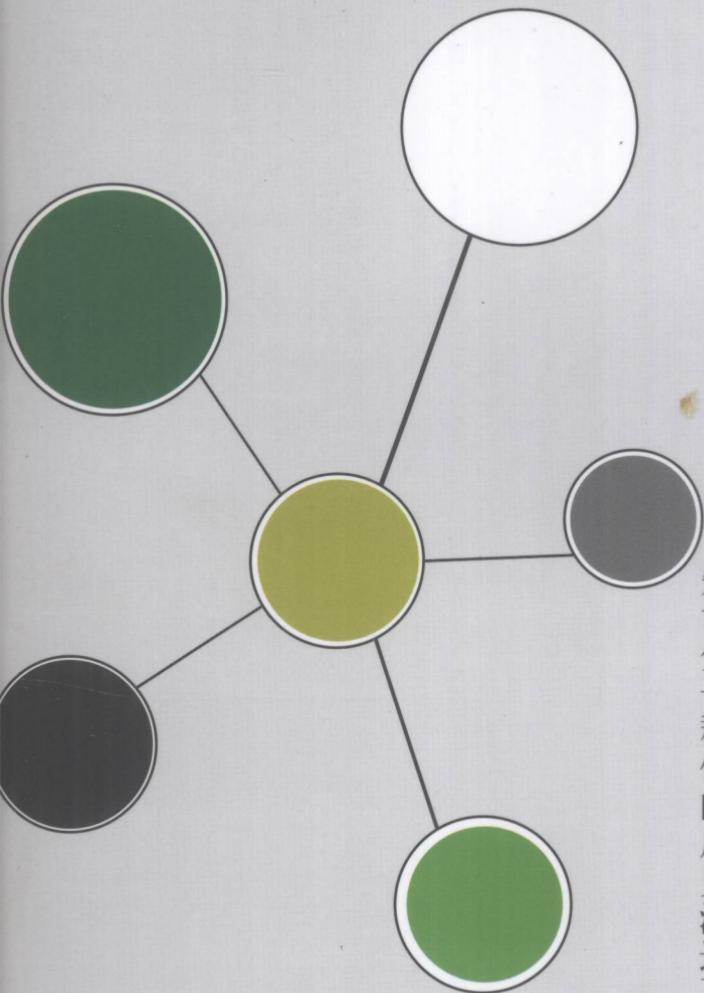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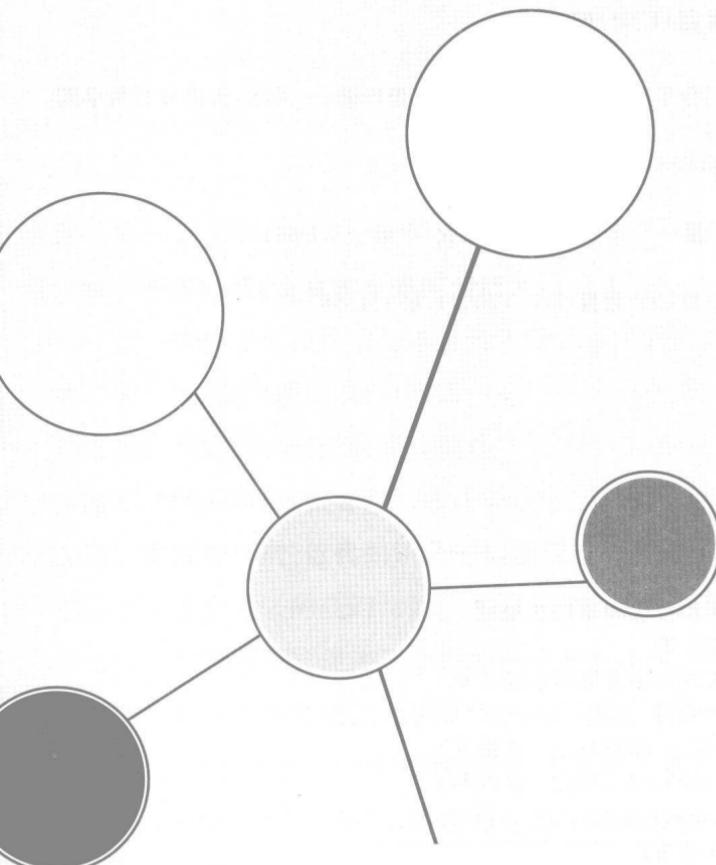


从中国的知识分子 到知识分子的中国

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演进及特征探析

翟爱玲 著





从中国的知识分子 到知识分子的中国

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演进及特征探析

翟爱玲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的中国/翟爱玲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688-461-4

I. 从… II. 翟…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1048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 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 / 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 址: www.tssap.com

印 刷: 天津市汇鑫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夏商周时期出现萌芽的初始状态到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再到今天的庞大群体，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四千余年。其间，每一次情感的涌动与成败都牵动着中国历史的步伐。因此，每每想动笔的时候总感所学甚微，生怕不能客观、真实地反应这个群体的面貌和性格，有悖于笔者的初衷。

偶尔读到钱学森先生下面的一段话：

“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你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

“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

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戌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你们不想写吗？你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

由此本人又萌发了写一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动。

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其实，仔细想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不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史吗？中国知识分子不就是历史的记录者和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吗？所以，当我们顺着历史的足迹去探析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时候，就如同摸着了历史的脉搏。

在 20 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找不到明显的社会经济转型的痕迹。两千年一以贯之，就是以农民与地主这一对矛盾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而传统知识分子也是在儒家文化主导下，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个字之间周游。如果不是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不是洋人的坚船利炮带来的“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大概依然停留在上述的状态之中，只不过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多了一点点历史的沧桑感而已，但依然是传统儒家理念所要求的君权的奴仆。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建立起来并在抗日战争中壮大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她是把消灭阶级、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写在自己旗帜上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最具本质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虽然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但在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诸方面却已经有了相应的准

备，亦步亦趋，紧跟其后。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高速发展，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利用特权、荫庇、高科技成果等优势分化到财富阶层去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迅速走向边缘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又一次处在社会转型之中，许多固有的事物都在出现着彻底的甚至难以估量的变化……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眼下似乎正在演绎着其阶层“生命”的最后一章。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环境发生了许多根本变化，将使他们从边缘化自然地走向消亡。但笔者以为，在传统知识分子消亡的同时，将又会有新的“后知识分子”群体诞生。因此，在本书中，笔者也是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自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以后知识分子的演化进程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在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很多方面，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而这些批评并非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否定，只是笔者就相关问题的真实看法。因为，本人亦是此阶层中的一员。

此外，本书中较多地提到了毛泽东。那是因为：如果不写毛泽东就无法写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知识分子及其历史。况且，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非常伟大与杰出的知识分子。笔者以为，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会为这个群体出了一个毛泽东而骄傲、而自豪。

好了，不再赘述。对于书中的观点、史实与相关论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作 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千年之路:由春秋走来的传统知识分子	(1)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界定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	(1)
第二节 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	(7)
第三节 “学而优则仕”的成长道路	(14)
第四节 “精华与糟粕并存”,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	(22)
第二章 觉醒与徘徊:近代知识分子的嬗变	(34)
第一节 历史风云的变幻与近代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	(34)
第二节 “西学东渐”促进了知识分子转型的步伐	(49)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是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因素	(62)
第四节 “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彰显	(68)
第五节 吸收、掘弃与烙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	(84)
第三章 叱咤风云: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崛起	(91)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的分野与重构	(91)
第二节 五四运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成	(103)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聚集	(109)
第四节 抗日战争,知识分子的爱国救亡实践	(121)
第五节 现代教育大众化与知识传播	(129)
第六节 毛泽东——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141)

第七节	时代赋予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特性	(157)
第四章 重生与裂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变迁		(161)
第一节	殊途同归：知识分子的群体集结与意识碰撞	(161)
第二节	赤子情怀：重回祖国怀抱的海外知识分子	(166)
第三节	又红又专：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177)
第四节	现实洗礼：反右与文革间的知识分子	(183)
第五节	上山下乡：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历史性实践	(191)
第六节	改革开放：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裂变	(196)
第五章 展望未来：知识分子的中国		(205)
第一节	高教大众化：高速生产线下的知识分子	(205)
第二节	未来知识分子地位的社会认同趋向	(212)
第三节	未来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216)
第四节	结语：知识分子的中国	(220)
后记		(223)

第一章 千年之路：由春秋走来的传统知识分子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界定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十分特殊、复杂的群体，其形成“可以追溯我国夏商周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使脑力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可能，从事或兼职从事图腾祭祀，神话解说，巫术占卜及其他仪式规范的人，逐渐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中分离出来。他们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① 在以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自身也经历着逐渐完善、壮大、演进的过程。学者对这个过程的评述与“知识分子”的定义一样众说纷纭，至今尚无一个准确、权威的定论。

但是，既然我们是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就不能不为它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客观又相对准确的界定。

首先，知识是什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知识”条目是这样表述的：“所谓知识，就它反映的内容而言，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的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就它的反映活动形式而言，有时表现为主体对事物的感性知觉或表象，属于感性知识，有时表

^① 贾平安：《中国知识分子大裂变》，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现为关于事物的概念或规律,属于理性知识”。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是主客体相互统一的产物。它来源于外部世界,所以知识是客观的;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事物的特征与联系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表征,知识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人脑的反映活动而产生的。

野中郁次郎(Nonaka)认为:知识是一种被确认的信念,通过知识持有者和接收者的信念模式和约束来创造、组织和传递,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也传递着一套文化系统。知识是从不相关或相关的信息中变化、重构、创造而得到的,其内涵比数据、信息要更广、更深、更丰富。

何光国则认为知识是:一、经验累积的纪录;二、事实组织的系统化;三、对事实的理解;四、一种理解的行为或状态;五、人的已知和未知。

由上述可知,知识是抽象的,是借由某种形式呈现以传达概念。例如:古代的结绳记事、白旗示降等,都是借由结绳、白旗等符号来传达概念的。但是当人类活动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则简单的符号就不足以传达双方的意念。因此,人类发明了文字、语言等符号以作为沟通的工具。但在沟通过程中还是需要经过思考,最后才能产生出知识。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一、知识是客观存在在主观意识的反映;
- 二、知识是反映事物内在规律的且被人们认可的;
- 三、知识是不断更新的,是经验积累的记录;
- 四、知识是可以相互传递的有形的、系统性的;
- 五、它是以符号为载体的,这个符号可以是文字语言,也可以是数字语言、公式以及现代计算机语言等等;

六、它包括了对人类未知的想像与探讨；

七、它是通过一部分人被总结与传播的；

八、脑力劳动是其主要的工作方式。

再来看“知识分子”的概念。这是一个被学界、学者讨论了无数遍却始终得不出一个统一、完满答案的问题。不少中国学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是西文的译语。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叶启政教授对此有比较详尽而集中的讨论，他就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源于西方。

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就现行较常用的英文来说，一个是 intelligentsia，另一个是 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intelligentsia 来自俄国，1860 年由作家波波里金 (Boborykin) 提出，专指 19 世纪 30 到 40 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到俄国的一小圈人物。当时的沙皇俄国相当落后，留学生带回西欧社会思想及生活方式，不满当时俄国的状况，或者满怀乌托邦的理想高谈阔论并模仿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着手实际的社会改革，他们当中后来产生出不同的思想群体，如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康德主义等。

另有学者认为，intelligentsia 这个词源于波兰，1844 年即由李贝尔特 (Karol Libelt) 使用。当时的波兰有一个文化上同质性很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体系都独具特色。这个阶层是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别，为了维持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中，学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突出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与社会责任。由此环境培养出来的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后来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为波兰受高等教育的人所继承，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国家大事为

己任。当波兰被列强分割时,这批人成为救国和反抗统治者的主要力量。因此,从 *intelligentsia* 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来看,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

Intellectual 来自法国,起源于 1898 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 1898 年 1 月 13 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 *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 *intellectuels* 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

就此传统来看, *intellectual* 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 *intellectual* 泛指“知识分子”,而 *intelligentsia* 则专指“知识阶层”。

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

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降,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担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则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以后，随着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在数量、学科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进入现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知识分子的功能在于解释外在世界，所以总是倾向于怀疑与批判，他们的想法和看法与社会现状或多或少总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照理性和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称作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

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却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

在我国学者众多的专著、论文里，许多人也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但却又都不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权威的界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东方如此，西方同样如此。究其原因，应与“知识”的界定有关，因为知识的本身就是抽象的。

在众多的论著中，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工作、交往和表达时，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和‘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符号象征体系可以是文字，可以是计算机语言，也可以是自然科学中的‘公式语言’（如数学语言、物理学语言等等）。这些人频繁地使用这类符号和一般性范畴，首先在于他们具有这种知识和能力，同时又是因为长期的个人兴趣、专业学习及以后的职业要求所导致的，即一方面他们有这种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又确实在经常地使用着它（参阅 Shils 1968）。与上述理论定义相应的操作定义是：现今的知识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①这个定义，使我们再去论述知识分子时就显得简单的多。

所以说，中国古代传统知识分子虽然萌芽于夏、商、周时期，但那只是展现了一个其阶层的雏形，而它的真正形成应该是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私学的兴起，涌现出大量的掌握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逐渐形成“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并被

^① 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 页。

统治者所重视利用。他们著书立说、传播文化,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依据并以“安邦定国”为己任,成为当时的一个显赫阶层——即“士”。他们开始频繁地使用文字这个“符号”,也符合了郑也夫先生的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定义。因此可以说:“士”阶层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真正始因,而孔子、孟子等则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

以后,虽经历了多次朝代的变更,但伴随着知识的丰富与变化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逐步发展壮大并始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第二节 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代以前。商周时代,中国教育已有相当的规模,知识已具备相当的积累,这就为学校教育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条件。西周时期则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发展时代,产生了私学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群体,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孔子、孟子、荀子等如群星璀璨,各领风骚,其教育思想竞相争辉。同时期还出现了像《大学》、《学记》、《劝学》、《弟子职》等这样的教育专著。这些教育专著是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奠定了中国传统精英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原始社会,人才选拔奉行“亲亲”原则;西周奴隶制社会后期,“选贤与能”成为其比较典型的方式。到春秋战国时期,为挽救贵族统治阶

层内“不学而士，仕而无学”的局面，封建政权采纳孔子“为政在人”的主张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观点，“礼贤下士”。他们大量吸收和重用社会贤能之士，致力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教育目的，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

孔丘，字仲尼（公元前 551～公元前 449 年），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弟子达 3000 人，身通六艺者 70 余人，其教育思想也十分丰富。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甚至比政令、刑律等更加重要和有效，提出了“庶、富、教”的理论，认为在人的成长和发展上，教育起着决定的作用。并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就是能“修己为安人”的治术人才。其弟子所著《论语》对其教育思想有着众多的记述。

孟轲，字子舆，世称孟子（约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 年），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他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的思想，提倡“王道”和“仁政”，反对武力兼并，主张省刑薄赋，提出“君轻民贵”说。他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在哲学上形成超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认为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所以只要加强修养，反求诸己，或者说通过教育去发展这些良知和善端，就“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重视修身养性。他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一大乐趣，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与概括“英才”教育——即精英教育的人。

荀况，字卿，世称荀子（约公元前 313～公元前前 238 年），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他与孟子的看法相反，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是恶的，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否认了人的所谓先验道德，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环境，通过礼仪法治来改造和约束人性。因而强调教育“化性起伪”的重要作用。主张以培养士、君子、

圣人为教育目的。“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以士为最低起点，以圣人为最高目标。

他首次提出教师的重要作用，提倡尊师，认为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法制的存废、人心的善恶，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荀子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认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这四者就是：尊严而惮、（老）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只有具备这四个条件，才可以为师。

但是，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还是之前的管仲，之后的郑玄等名哲，以及与其儒家思想对立的商鞅、韩非等法家诸子；虽然他们的政治见解与教育内容互不相容，但在教育目的与造“士”途径上却是一致的。不管是儒家的对“修己为安人”的治术人才的培养；还是法家对“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的造就，他们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培养和形成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汉代大一统格局形成后，独尊儒家思想。采用察举选士制度，中央设立太学并为博士置弟子，作为培养英才的专门机构，开创了我国精英教育史上的国家化制度，成为历代王朝精英教育所遵循和仿效的一种普遍模式。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开设五经博士，弟子员 50 人，“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西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王莽作宰衡时，“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东汉太学发展更快、规模更大。顺帝时，“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质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精英教育模式，中央设立“国子学”和“四门学”并建立了一些高等专门学校，州、郡也普遍设置学校，强化贵族特权